

茅海建  
戊戌变法  
研究

# 戊戌变法的另面

“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

茅海建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茅海建  
戊戌变法  
研究

# 戊戌变法的另面

“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

茅海建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8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茅海建戊戌变法研究 / 茅海建著. — 北京: 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6  
ISBN 978-7-108-06157-7

I. ①茅… II. ①茅… III. ①戊戌变法—研究  
IV. ①K256.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61969号

“茅海建戊戌变法研究”含四种:

《戊戌变法史事考初集》《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从甲午到戊戌:  
康有为〈我史〉鉴注》《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

《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

单行本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并授权“茅海建戊戌变法研究”套书使用

特邀编辑 孙晓林

责任编辑 冯金红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印制 宋 家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6月北京第1版

2018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1—3,000套

定 价 395.00元(全四种)

(印装查询:01064002715; 邮购查询:01084010542)

## 茅海建戊戌变法研究

# 总序

1998年，戊戌变法一百周年，我结束了先前的两次鸦片战争史研究，开始研究戊戌变法。2018年，戊戌变法两个甲子，一百二十周年，我的研究还没有结束，仍然在路上。

时光又逢戊戌，我也应当想一下，这二十年究竟做了什么，又有着什么样的经验教训？

当我开始研究戊戌变法时，有两位朋友善意地提醒我：一、戊戌变法是所有的中国近代史大家都涉及过的领域，很难再有突破；二、戊戌变法的材料搜集和利用，已经差不多了，不太可能出现大规模的新材料。他们的提醒，告诉此处水深，不可掉以轻心。于是，我就做了“长期”的打算，准备用十年时间来研究戊戌这一年所发生的事情。

我最初的想法是将戊戌变法期间重大事件的史实和关键时刻的场景，真正了解清楚。由此而重新阅读全部史料，力图建立相对可靠的史实，以能从这一基础上展开逻辑思维。即“史实重建”。于是有了《戊戌变法史事考》（2005，再版时更名为《戊戌变法史事考初集》）和《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2011）。

也就在这一研究过程中，我感到康有为亲笔所写的回忆录《我史》是一部绕不过去的关键史料，用了整整五年的时间来作注，以鉴别真伪。特别让我兴奋的是，我看到了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手稿，解决了许多问题。于是有了《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2009）。

在我的研究计划中，要写一篇张之洞与康有为的文章，所利用的基本资料是新编的《张之洞全集》。文章大体写好，我又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查阅“张之洞档案”，准备再补充一些材料。谁知一入档案馆，发现了一大批未被利用的史料。兴奋之余，再度改变研究方向，集中研究这批史料。于是就有了《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2014）。

以上便是此次集中汇刊的四本书的由来。“史实重建”的想法一直没有变，我在研究中最基本的方法是考据。

然而，考据不是我的目的，“史实重建”亦是为逻辑思维建一扎实之基础。我的最终目标是写一部总体性的叙述戊戌变法史的著作。2011年夏，我为《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作序，称言：“……我也希望自己能加快进度，在最近的一两年中完成手中的细节考据工作，而回到宏观叙事的阳光大道上来。但愿那阳光能早一点照射到我的身上。”那时，我心中的研究时限已扩大了一倍，即二十年，自以为到2018年（戊戌），将会最终完成戊戌变法的研究。

一项认真的研究，虽然能有许多次的计划，但其进度总是不能按照其计划刻板地前进。一个认真的研究者，虽然知道其最终的目标，但总是不能测量出行走路途的长度。2014年起，我的研究一下子陷于瓶颈——我正在研究康有为的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但不能判断其“大同”思想的最初发生时间，以及这一思想在戊戌变法期间的基本形态。我找不到准确的材料，来标明康有为思想发展各阶段的刻度。直到两年之后，由梁渡康，我从梁启超同期的著述中找到了答案，由此注目于“大同三世说”。我的研究计划又一次改变了。

整整二十年的研究，我对戊戌变法的看法有了很大的变化（自以为是深化）。随着研究进展，在我的头脑中，原先单一色彩的线条画，现在已是多笔着色，缤纷烂漫；原先一个个相对固定的场景，现在已经动了起来，成了movie。这种身临其境的感受，让我又一次觉得将要“回到宏观叙事的阳光大道上来”，而时光却悄悄地已进至戊戌。

整整二十年的研究，我对戊戌变法的研究也有了新的感受（自以为

是痛感)。前人的研究是极其重要的，但若要最后采信，须得投子“复盘”；那些关键性的节点，还真不能留有空白，哪怕再花工，再花料，也都得老老实实在地做出个基础来。由此，这二十年来，我一直不停地在赶路，经常有着“望山跑死马”的感受。我虽然不知道到达我个人的最终目标，还需得多少年，还须走多少路；但我坚信不疑的是，戊戌变法这个课题所具有的价值，值得许多历史学家花掉其人生经历的精华时段。李白《临路歌》唱道：

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  
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石袂……

戊戌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一百二十年前，有其“飞”，有其“振”，因“中天”之“摧”而“力不济”；然因此而生、不能停息的“余风”，仍在激荡着这个国家，以至于“万世”，而其“石袂”（左袂）也挂到了高达千丈、象征日出的“扶桑”树上……

茅海建

2018年1月于横琴

# 自序

史料的发现真是让人惊心动魄，在我研究戊戌变法已达十年之后，阅读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所藏“张之洞档案”，不由又有了牖开思进之感受。

很长时间以来，戊戌变法史的研究，以康有为、梁启超留下的史料为基础，构建成当前戊戌变法史的基本观点、述事结构和大众认识。尽管也有一些历史学家对康、梁的一些说法提出了质疑，但毕竟没有新的大量的史料可供其另辟新途。历史学家陈寅恪言及戊戌变法的思想源流，称言：

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也。咸丰之世，先祖亦应进士举，居京师。亲见圆明园干霄之火，痛哭南归。其后治军治民，益知中国旧法之不可不变。后交湘阴郭筠仙侍郎嵩焘，极相倾服，许为孤忠闳识。先君亦从郭公论文论学，而郭公者，亦颂美西法，当时士大夫目为汉奸国贼，群欲得杀之而甘心者也。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无邪堂答问”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深以为然。据是可知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sup>〔1〕</sup>

陈寅恪指出从实际经验中得知须借重西法改旧法的陈宝箴，与从“今文”

〔1〕《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陈寅恪集·寒柳堂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67页。“先祖”，湖南巡抚陈宝箴。“先君”，吏部主事陈三立，曾游张之洞幕，戊戌时随侍陈宝箴于长沙，对湖南的变法多有作用。

经、“公羊”学中推导出“孔子改制”之说的康有为，有着思想渊源的不同。他的这一评论，具有指向性的意义，其基本史实方面当得自于其“先祖”与“先君”。然长久以来，学术界对陈寅恪的这一说法有过许多次引用和赞赏，但一直不能予以证明。这是因为陈宝箴、陈三立父子留下的关于戊戌变法的材料太少。<sup>[1]</sup>

而与陈宝箴属同一政治派系的张之洞，却留下了相当完整的档案。<sup>[2]</sup>

“张之洞档案”的主体部分，是张之洞的幕僚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全集》时所据之原件或抄件，还留有许同莘的许多抄目与批注，上世纪50年代由张之洞曾孙张遵骝赠送给近代史研究所；另有一些是近代史所图书馆历年购置、收集而入藏的；总计492函，内有两千余册及数以千计的散页。<sup>[3]</sup>其中关于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庚子事变及清末新政的内容相

[1] 陈宝箴的部分档案，现存于上海图书馆，已由许全胜、柳岳梅整理发表，见《陈宝箴遗文》（《近代中国》第11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陈宝箴遗文（续）》（《近代中国》第13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他们又整理发表了《陈宝箴友朋书札》，分四部分在《历史文献》第三至六辑连载（其中第三、四、五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0年4月、2001年1月、2001年8月；第六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2月）。汪叔子、张求会编：《陈宝箴集》（中华书局，上册，2003年，中册、下册，2005年），搜集细心，汇录各说，是重要的史料。

[2] 与陈寅恪所言陈宝箴、陈三立之思想渊源大体相同，又可见之于张之洞的幕僚辜鸿铭的说法。他称言，张之洞原本属于清流，“尚知六经大旨，以维持名教为己任。是以文襄在京曹时，精神学术无非注意于此。即初出膺封疆重任，其所措施亦犹是欲行此志也。洎甲申马江一败，天下大局一变，而文襄之宗旨亦一变。其意以为非效西法图富强无以保中国，无以保中国即无以保名教。虽然，文襄之效西法，非慕欧化也；文襄之图富强，志不在富强也。盖欲借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即所以保名教……”（《张文襄幕府纪闻》，黄兴涛等译编：《辜鸿铭文集》，海南出版社，1996年，上册，第419页）从陈宝箴的最初起家而言，属湘系集团，但他与张之洞的关系至少可以追溯到光绪十二年，张于两广总督任上奏调陈宝箴至广东，委派各种差使。光绪十六年至二十年，陈任湖北按察使，为张之洞的下属；光绪二十一年升任湖南巡抚，名份上仍是湖广总督张之洞的下属。对于这一段经历，《清史稿·陈宝箴传》称：“是时张之洞负盛名，司道咸屏息以伺。宝箴初馆鄂藩，遇事不合，独与争无私挠，之洞虽不怪，无如何也。久之，两人深相结，凡条上新政皆联衔，而鄂抚谭继洵反不与。”（《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第42册，第12741页。“藩”为布政使，陈曾署理湖北布政使）从“张之洞档案”及两人留下的文献来看，相互间电报书信往来甚密，政治见解大体一致，可以认为是属同一政治派系。具体的情况，可参见本书第五章及附录。

[3] 就我所知，最初系统利用这批档案的是李细珠教授，见其著《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还需说明的是，除了该部分档案外，另外还有两部分材料也很值得注意：一、



当丰富，然我所感兴趣者，是涉及戊戌变法的史料——该类材料的数量虽不很多，但也有数百上千之规模。

尽管从广义上说，戊戌变法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所包含的内容相当丰富，相关的史料也极多，一辈子都无法读完；但若从严格的政治意义上去分析，戊戌变法大体上就是“百日维新”，是一次时间非常短暂的政治事件。其主要活动在北京、在政治上层，且只有少数人参与其间，绝大多数人置身事外，闻其声而不知其详。又由于政变很快发生，相关的人士为了避嫌，当时没有保留下完整的记录，事后也没有详细的回忆，一些原始史料也可能因此被毁。也就是说，今天能看到的关于戊戌变法的核心史料仍是不充分的。

戊戌变法的主要推动者康有为、梁启超，政变后避往海外，完成一系列关于戊戌变法的著述，也成为后来研究戊戌变法的重要史料。<sup>〔1〕</sup>毫无疑问，康、梁是当事人，他们的著述自然有着很高的价值，但他们著述的目的，不是为了探讨历史的真相，而是其政治斗争的需要，故在其著述中有着诸多作伪。康、梁作为政治活动家，此类行动自有其合理性，但给今日历史学家留下了疑难，若信之，必有误，若不信，又从何处去找戊戌变法的可靠史料？

台北中研院院士黄彰健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孔祥吉教授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员陈凤鸣先生分别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馆、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和档案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故宫博

---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图书馆所藏抄本《张文襄公督楚公牍》，共计 17 册，抄本《张之洞电稿》，共计 47 册。其中《张文襄公督楚公牍》、《张之洞电稿》中的“发电”部分，已由赵德馨主编之《张之洞全集》（武汉出版社，2008 年，本书引用《张之洞全集》，凡未注明者，皆为该版本）收录；而“来电”部分，因非张之洞本人之作，该全集因体例而未收录，其中也有一些关于戊戌变法的材料。二、《近代史资料》，第 109 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发表了东方晓白《张之洞（湖广总督府）往来电稿》。据责任编辑刘萍女士告我，这批信件属私人收藏，“东方晓白”是其笔名，且这批收藏中有价值者皆已发表。我曾试图联系收藏者，以能过目，未能如愿。

〔1〕康、梁在这方面最重要的著作为：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康有为的《戊戌奏稿》和后来发表的《康南海自编年谱》（又称《我史》）。康、梁在其他著述中还有许多分散的关于戊戌变法的叙述。

物院图书馆，发现了大量档案或当时的抄本，主要是康有为等人当时的奏折，揭示出康有为等人在《戊戌奏稿》中的作伪，对戊戌变法的研究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sup>[1]</sup>然而，当此项史料搜寻工作大体完成后，还有没有新的材料——特别是康、梁一派以外的材料，可用来研究戊戌变法？

正因为如此，当我读到“张之洞档案”中关于戊戌变法的大批史料，一下子就感受到追寻多年的目标突然出现时那种心动加速、喜出望外，于是，我立即放下了手上的工作，改变研究计划，专门来阅读与研究这一批材料。

我在阅读“张之洞档案”的过程中，最为突出的感受是，这批史料给今人提供了观察戊戌变法的新角度：

其一，张之洞、陈宝箴集团是当时清政府内部最大的政治派系之一，也是最为主张革新的团体。他们对康有为、梁启超的看法，对变法的态度，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戊戌变法是体制内的改革，须得到体制内主要政治派系的参加或支持，方有可能得以成功。当人们从“张之洞档案”中看到张之洞集团以及当时主要政治人物对康、梁所持的排斥乃至敌对态度，似可多维地了解变法全过程的诸多面相，并可大体推测康、梁一派的政治前景。

其二，以往的戊戌变法史研究，经常以康有为、梁启超的说法为中心；而“张之洞档案”中这批出自康、梁之外的材料，可以让研究者站在康、梁之外的立场，来看待这次改革运动。<sup>[2]</sup>兼听者明。由此，易于察看

[1] 我在这里特别强调以下学术贡献：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五十四，1970年，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康有为戊戌真奏议》，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料丛刊，1974年；孔祥吉：《戊戌维新运动新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救亡图存的蓝图：康有为变法奏议辑证》，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丛书，1998年；《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陈凤鸣：《康有为戊戌条陈汇录——故宫藏清光绪二十四年内府抄本〈杰士上书汇录〉简介》，《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1期。

[2] 杨天石教授指出：“多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思维方式，凡进步人物说的话都可信；凡反面人物说的话都不可信”，“在戊戌政变史的研究和阐述上，我们被康、梁牵着鼻子走的时间已经够

到康、梁一派在戊戌变法中所犯的错误。

其三，由于这批材料数量较多，准确度较高，许多属当时的高层秘密，可以细化以往模糊的历史细节，尤其是历史关键时刻的一些关键内容。这有助于我们重建戊戌变法的史实，在准确的史实上展开分析，以能较为客观地总结戊戌变法的失败原因。

也就是说，原先的戊戌变法史的研究，主要依靠康有为、梁启超留下的史料，并进行了多次辨伪识真，建立起当今戊戌变法史实结构的“正面”——尽管这个正面还有许多瑕疵和缺损；那么，通过“张之洞档案”的阅读，又可以看到戊戌变法史实结构的“另面”——尽管这个另面也不那么完整和清晰。任何事物都是立体的，多维观察的重要意义，本来是不言而喻的；但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对于阅读历史的读者来说，由于史料的保存多有缺憾，能够阅读到历史的“正面”同时又阅读到历史的“另面”的机会并不多。这是我的一种幸运。

我必须说明，本书只提供了戊戌变法的“另面”，读者若要建立起戊戌变法史的完整认识，当然还要去看看其“正面”。

我还需要说明，由于本书所引文献皆用中国传统纪年，时间又相对集中，为避免过多换算而引起读者的理解不便，本书使用中国传统纪年，并在必要处夹注公元。

当我看到“张之洞档案”中那些激动人心的史料，却进入了奇妙吊诡的生活。我刚刚从北京大学返回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去北京的近代史研究所看档案，反而成了不太方便的事情。于是，我只能在课余或假期飞北京，尽可能地躲开近代史所的各位师友，以节省时间，多看一点。在此向各位师友致歉。资料搜集工作进行近半，我又与《中华文史论丛》的老编审蒋维崧先生商量，想做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在刊物上进行论文连载。

---

长的了”。《袁世凯〈戊戌纪略〉的真实性及其相关问题》，《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5期。

蒋先生闻此一口应允。开场的锣鼓敲响了，我又发现，每三个月结一次账，实在是一桩让人吃不消的力气活。为了按时交稿，又找了朋友，跑到政治大学，躲了五个多月，完成了本书三分之一的工作量。本书的主要部分曾作为论文在《中华文史论丛》上连载，该刊精细的编校工作让我想起来就感动不已——现在很少能见到如此认真的编辑与校对，且也不见这般柔中有刚的催稿手法。这批论文发表后，我又放了一段时间，以能发现错误，随时进行修改。此次再跑到中央大学，为的是再躲上三个星期，以进行最后一次修订。写下以上这些私人性的话语，是为了感谢那些帮助过我的诸多人士——蒋维崧先生、林虞生老先生、胡文波先生、唐启华教授、吕绍理教授、汪朝光教授、金以林教授、马忠文教授、深町英夫教授、张玉萍博士……而我心中最为感谢的，自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的管理人员，尤其是茹静女士，我在那里度过了许多阳光灿烂的美好时光。

茅海建

2013年6月于永山

# 目 录

自 序 / 1

导 论 / 1

一、张之洞、康有为的初识与上海强学会、《强学报》 / 2

二、从陈庆年日记看张之洞及其派系的内情 / 24

三、《劝学篇》与《正学报》 / 37

四、戊戌变法期间张之洞召京 / 51

第一章 / 75

**张之洞之子张权，之侄张检、张彬的京中密信**

一、李景铭与《张文襄公家藏手札·家属类》 / 76

二、张权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二日来信 / 78

三、张权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来信 / 100

四、张权光绪二十四年来信两残件 / 109

五、张检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二日来信 / 114

六、张彬光绪二十四年正月来信及光绪二十一年一残件 / 118

## 第二章 / 131

### 张之洞与杨锐

- 一、杨锐是张之洞的“坐京” / 133
- 二、光绪二十一年三月至二十二年正月杨锐给张之洞的密电及光绪二十二年正月给张之洞的密信 / 145
- 三、戊戌变法期间张之洞给杨锐下达的指令 / 157
- 四、光绪二十四年杨锐的两件密信：孔祥吉发现的“百日维新密札”作者应是杨锐 / 166
- 五、张之洞营救杨锐的行动 / 174

## 第三章 / 187

### 戊戌政变前后张之洞与京、津、沪的密电往来

- 一、张之洞给张权、张检、黄绍箕等人的指令 / 188
- 二、江西试用道恽祖祁 / 195
- 三、奏调湖北差委分省补用知府钱恂 / 199
- 四、湖北按察使瞿廷韶 / 209
- 五、天津委员巢凤冈 / 214
- 六、太常寺少卿盛宣怀 / 219
- 七、上海委员赵凤昌与曾磐 / 222
- 八、余论 / 231

#### 第四章 / 235

### 张之洞与《时务报》、《昌言报》

#### ——兼论张之洞与黄遵宪的关系

- 一、相关背景：《时务报》的创办与汪、梁矛盾 / 237
- 二、张之洞与黄遵宪的交谊 / 243
- 三、黄遵宪对《时务报》内部分歧的态度及张之洞幕中反应 / 256
- 四、《时务报》改官报与汪康年、张之洞等人的对策 / 263
- 五、汪康年改《时务报》为《昌言报》与光绪帝旨命黄遵宪“查明”“核议” / 273
- 六、黄遵宪对事件的处理 / 279
- 七、戊戌政变之后 / 290

#### 第五章 / 299

### 张之洞与陈宝箴及湖南维新运动

- 一、张之洞与陈宝箴的早期交谊 / 301
- 二、湘鄂之间 / 319
- 三、《湘学报》之争 / 340
- 四、张之洞奉召进京与陈宝箴的建策 / 350
- 五、张之洞、陈宝箴联衔上奏变科举及与康有为的间接交锋 / 354
- 六、陈宝箴与康有为的直接交锋与保举张之洞 / 365
- 七、陈宝箴的罢免与保卫局的保全 / 373

八、尾声 / 383

附录一 陈宝箴之死 / 386

附录二 张之洞与谭继洵父子、于荫霖的关系——罗惇融对《抱冰弟子记》的误读 / 390

附录三 康有为一派对陈宝箴父子政治态度的误解与夸张 / 410

第六章 / 427

### 戊戌前后诸政事

一、光绪十九年刘坤一查办张之洞 / 428

二、光绪二十年至二十一年起用容闳 / 434

三、光绪二十一年李提摩太的“妙法” / 451

四、光绪二十二年查验刘鹗的假资产证明 / 467

五、光绪二十二年为李鸿藻治病 / 477

六、光绪二十四年清朝决策岳州自开通商口岸 / 489

七、光绪二十四年康有为香港谈话、来信及“密诏”在上海发表与张之洞等人对此的反应 / 503

八、光绪二十六、二十七年策反邱菽园 / 514

九、光绪二十七年请奖梁庆桂等人赴西安报效事 / 531

十、光绪二十七年请废大阿哥 / 536

征引文献 / 545



## 自序

史料的发现真是让人惊心动魄，在我研究戊戌变法已达十年之后，阅读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所藏“张之洞档案”，不由又有了牖开思进之感受。

很长时间以来，戊戌变法史的研究，以康有为、梁启超留下的史料为基础，构建当前戊戌变法史的基本观点、叙事结构和大众认识。尽管也有一些历史学家对康、梁的一些说法提出了质疑，但毕竟没有新的大量的史料可供其另辟新途。历史学家陈寅恪言及戊戌变法的思想源流，称言：

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也。咸丰之世，先祖亦应进士举，居京师。亲见圆明园干霄之火，痛哭南归。其后治军治民，益知中国旧法之不可不变。后交湘阴郭筠仙侍郎嵩焘，极相倾服，许为孤忠闳识。先君亦从郭公论文论学，而郭公者，亦颂美西法，当时士大夫目为汉奸国贼，群欲得杀之而甘心者也。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无邪堂答问”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深以为然。据是可知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sup>[1]</sup>

陈寅恪指出从实际经验中得知须借重西法改旧法的陈宝箴，与从“今文”

---

[1]《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陈寅恪集·寒柳堂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67页。“先祖”，湖南巡抚陈宝箴。“先君”，吏部主事陈三立，曾游张之洞幕，戊戌时随侍陈宝箴于长沙，对湖南的变法多有作用。